

中国式现代化
CHINESE MODERNIZATION

“两个结合”对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启示

■ 陈方刘

提出“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总结长期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经验得出的珍贵启示,是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鲜明标志,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当然也需要在“两个结合”中构建。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两个结合”对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至少有三点重要启示。

必须立足中国具体实际

“两个结合”的第一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表述既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真理性的坚守,因为马克思主义具有“普遍原理”,又体现了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因为马克思主义除了具有“普遍原理”之外,还具有一些“别国经验”和“个别结论”。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要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问题,这启示我们必须立足中国实际,紧紧围绕解决“建设什么样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问题,不断推进与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理论。

这无疑蕴含着对“现代化=西方化”迷思的批判,更加坚定了立足中国具体实际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信心。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美好愿景,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也同样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这就需要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时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也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成功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当然,对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都不能采取“拿来主义”,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其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也必然不一样。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

在“两个结合”重大论断提出之前,通常用“一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表述,

这里的“中国具体实际”也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毛泽东在1938年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时就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割断历史。从孔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但随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日益深化,同“中国具体实际”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这就需要使“一个结合”变成“两个结合”的新叙事。这启示我们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过程中,要更加深入地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

“怎样对待本国历史?怎样对待本国传统文化?这是任何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解决好问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化解了外来文化与中国固有文化之间的文化矛盾,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有机统一起来。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特别指出:“把

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这就要求我们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过程中要更好地把传统与现代贯通起来、融通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

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两个结合”的主语是一个,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根本目的也是一个,即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有一定的底线,那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坚守。同样,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当然,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并不是把这些基本原

则当作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不可改变的教条,也不是把这些基本原则作为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出发点。在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践中,共产党人必须坚持自己的立场、态度和行为准则,这就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防止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被实用化,这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同样需要立足中国具体实际,在不断回答“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问题中归纳总结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不能因为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样式”而忽视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属性,要在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理论。

警惕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被同化。中国传统文化既具有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又具有无比强大的同化能力,在中国历史上不断上演的征服者(武力上征服)被征服(文化上征服)的故事就是明证。鲁迅先生在《华盖集·

补白》中用文学的语言深刻地指出:“谁说中国人不善于改变呢?每一新的事物进来,起初虽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会改变。不过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因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同样也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而且,即使优秀传统文化也必须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两个结合”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不是两个问题。其中,“第一个结合”是“第二个结合”的基础,并为“第二个结合”提供实践指向;“第二个结合”是“第一个结合”的深化,并通过以文化人的作用推动“第一个结合”,也是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点任务。只有把“两个结合”结合起来,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从“外在”变成“内在”,实现“彻里彻外”的中国化时代化。这也启示我们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过程中,要把解决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突出问题同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有机统一起来。这既有利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也有利于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独特的世界意义。

(作者为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上海市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本文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项课题“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研究”阶段性成果)

前沿

从六方面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 陈琪

文化产业是推动经济体系转型升级、拉动国民经济支柱性增长、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是坚定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衡量文化产业发展质量和水平,最重要的不是看经济效益,而是看能不能提供更多既能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又能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文化产品。”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时代命题,并就“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作出战略部署,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确立了科学路径。

抓龙头,健全现代化文化产业体系和文化市场体系

现代化文化产业体系和文化市场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文化自信自强的头等任务和必要条件。激活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延伸“文化+”“+文化”触角,加强对现代化文化产业顶层设计,出台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文化产业政策,构筑创新链、技术链、人才链、供应链、数据链、资金链、服务链,革新文化旅游、文化产权、文化装备、知识产权、影视综艺、网络文学、动漫视听、电竞游戏、广告传媒、书画展览、音乐演艺、文遗保护等全品类产业体系,拉开产业跨界延伸广度,挖掘产业垂直细分深度精度。加强文化产业培育和规范,健全文化资产评估和文化产权交易体系,打造综合性、专项性、区域性文化产品和服务交易平台,放宽市场准入、破除市场壁垒,促进公平竞争、保护知识产权,完善市场准入退出机制,促进文化资源、生产要素和市场交易自由开放合理流动。

控源头,加强优质内容创作和优异策划创意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改革开放发展历程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底蕴丰厚、资源丰富,是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取之不尽的源泉富矿、文化自信自强的根脉底气。文化产业以内容为王,以创意为魂,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对标靶向,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遵循“首创、原创、原创、独创、独家、独立、独到、独特、首发、首演、首映、首展”的文化精品精粹路径,守正创新、推陈出新、激浊扬清,策划前端、制作后端,呈现终端

皮影造型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全程品控,推进体裁、题材、形式、手段一体互融,增进观念、风格、流派、见解切磋互鉴,既要有阳春白雪也要有下里巴人,既要顶天立地也要铺天盖地,以立得住、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用得好的文化产品作品和文化体验供给,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建码头,开发文化产业园区和重大文化项目

文化产业园区和重大文化项目,是承载文化产业聚沙成塔、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平台基地,是经济活动密集区、创意企业集聚区、潮流文化策源地和高端资源交汇地。以规划领先、长板聚焦、系统设计、重点突破的定位,打造品牌支撑、各具特色、差异互补的文创产业园区、都市文化生活圈、数字出版楼宇、文化贸易基地、区域性文化产业轴带环,促进业务合作、降低交易成本。实施重大文化项目带动战略,把重大文化项目作为稳投资“动力源”、促增长“压舱石”,开建主题公园、度假乐园、城市书房、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歌剧院、影视基地、演艺中心、电竞中心等文旅新地标和消费区,建设文化民生项目,配置既有大项目牵引又有中小微铺垫的产业梯队,形成“产品连项目、项目贴市场、市场引资本”的良性循环,释放项目集中、企业集结、要素集聚、业态集群的乘数效应。

盯势头,培塑新型文化业态和文化消费模式

与技术同行、与消费同频,这是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必由之路。顺应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大

势,依托元宇宙、区块链、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等新技术对文化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价值链、赋能升级,以深层应用为导向、以深度融合为目标,以智能、互动、在线、精准、跨界为特征,塑造“IP、ID、IT”融合发展新场景,以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以多样化需求转变和促成新供给。着眼需求端变革,文化消费趋向个性化、可视化、场景化、社群化、便利化,推出刺激消费的政策主张,培育娱乐消费、时尚消费、体验消费、品质消费、美丽消费、终端消费等新型消费形态。着手供给端发力,重组要素、再造场景、升级流量、创新价值、普惠民生,整合在线、在地、在场文化生产方式,定制生产有趣好玩、出圈裂变的高文化容量新业态、高技术含量新模式和高附加值能量新产品。

立潮头,催生市场主体活力和两个效益统一

在文化产业深化“放管服”和“一网通办”改革,注重树立高线和坚守底线相结合、服务引导和监管规范相结合,强化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管理与队伍建设,加强文化行业组织建设,推开文化中介服务,构建以内容监管为核心、以信用监管为基础、以分类监管为特色、包容审慎监管、柔性温度执法的新型监管机制,净化以“管得住”保障“放得开”的文化产业健康有序发展生态圈。持续改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运用金融工具为文化企业发展全生命周期输血造血,助力文化领军企业、上市企业、头部企业、“独角兽”企业、“新势力”企业高位发展,扶持“专、精、特、新”中小微企业企业茁壮成长。所有文化市场主体和企业

都要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的关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升级,适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经济效益服从于社会效益,自觉追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社会价值与市场价值相统一、社会责任与创作自由相统一。

重源头,造就文化文艺和企业经营管理人才

人才是文化产业第一资源,是高质量发展核心驱动力。坚持把人才队伍建设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立足点,实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寻觅人才求贤若渴,发现人才如获至宝,举荐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各尽其能、评价人才恰如其分、激励人才正当其时,营造“水深则鱼如聚,林茂则鸟有归”的良好环境,培养一支德艺双馨、德才兼备的文化名家、艺术大家、首席专家、能手行家、传承世家队伍,培养一支会谋势、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精管理、复合型的文化企业家和高管队伍,培养一支具有前瞻性理念、原创性贡献、数字化思维、系统化工具、应用型技能、实干型精神的中坚骨干队伍,为推动高质量文化发展、引领高品质文化生活、优化高水平文化供给、实现高效能文化治理提供坚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广大文化产业工作者要争当树立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走向文化自信的“领头羊”“领路人”“领跑员”,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征程中建功立业、书写传奇。

(作者为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基地特约研究员)

新语

着力完善公共安全体系

■ 刘军

公共安全关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前提和基础,是建设“平安中国”的核心议题,是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民生福祉得以不断提升的重要保障,是体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作出战略部署,提出: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建立大安全大应急框架,完善公共安全体系,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其中“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是公共安全治理模式的重大转向和伟大实践,是“预防性法律制度”理论在公共安全治理中的具体化,是对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再总结、理论再提升和制度化再深化。

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公共安全治理也面临诸多挑战,包括人口老龄化、城市化进程加快、网络安全风险等,统筹发展和安全需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整体把握:

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

一是加强理论研究,增强政策创新能力。以跨学科、综合性的研究思路应对未来公共安全治理的挑战,注重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加强学术交流和团队合作。需要加强公共安全治理的理论研究,加强对公共安全治理政策和实践的评估和研究,探索新的治理模式和方法。同时,要加强实践创新,推动公共安全治理的落地应用,推进公共安全治理的全面发展、深入、持续发展。未来公共安全治理需要加强政策创新,制定更加科学、合理、有针对性的公共安全政策和法规,建立健全公共安全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同时,要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借鉴和吸收国际先进经验,提高公共安全治理的水平和质量。

二是强化技术治理的法治保障。公共安全治理需要加强信息化建设,提高公共安全风险的预测、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能力。构建智能化犯罪治理平台和人工智能辅助决策的应急指挥系统,实现精准治理、动态治理和功能性治理。提高在犯罪侦查、治安防控、应急处置、预防被害等方面的决策效率和反应速度。有必要加大投入,在全国范围内构建人工智能辅助决策的应急指挥系统,并加强网络犯罪预防性治理中的联网、联防、联动和联控。同时要健全关键技术治理规范,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防范跨境网络犯罪预防性治理方式的技术风险,以法治化推进治理方式的转变,强化技术治理的法治保障。

三是健全多元主体参与治理。“人民主体性”是预防性公共安全治理在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以人民为中心”就是“人民主体性”,是主体性理论的当代发展与中国实践,是“善”于治理和治理于“善”的最终目的和衡量标准。预防性公共安全治理体系的构建,尤其是“事前预防”和“超前预防”等治理措施都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防止预防性治理措施荒疏走板。唯有如此,才有可能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共同参与、共同治理、共享治理成果。此外,公共安全治理也需要更加注重文化建设和公众参与,加强对公共安全治理的法治化、民主化和社会化建设,提高公众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强调公共利益与群体责任、个体义务和人格自律,强调主体性地调处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纠纷,强调多元主体参与构建共治共享的公共安全治理新范式。

四是落实、完善和创新“四个治理”。“预防性犯罪治理”是对“四个治理”(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的落实、完善和创新,是方法论层面、实践层面和操作层面的犯罪治理模式。未来公共安全治理需要完善法治建设,建立健全公共安全法律体系,提高法律的适应性、前瞻性和协调性,加强公共安全事件的法律责任追究和赔偿机制。创新社会管理机制,不断提高治理能力和善治治理体系,“善于治理”并“治理于善”。

构建预防性法律制度体系

五是构建预防性法律制度。以公法一体化理论对公共安全预防性法律制度进行体系性研究和系统性优化,构建公共安全预防性法律制度的一体化体系;健全公共安全风险的预测、预警与监测制度体系,对于重大公共安全风险应当采取源头治理,事先主动采取预防性措施,早发现、早报告,加强监测与预警;完善多元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和调处制度体系,社会矛盾纠纷前置调处与化解、事发预警与控制、事中响应与处置、事后恢复与问责等预防性法律制度,严防危险的发生和累积;构建立体化、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探索“关口前移”的“零级预防”。公共安全事前预防性治理模式的优势在于精准防控和主动干预,是一种主动防御型的公共安全治理模式。为此应当建立大安全大应急框架,做好充分的事前应急准备,不仅是源头严防、过程严管、风险严控,而且是效益最大化的“分级预防模式”,以便在不同阶段更有针对性地采取应对措施。

预防性法律制度理论直接源于“枫桥经验”,直面我国当下的公共安全治理问题,极具针对性和现实性。预防性治理思想溯源于优秀传统文化,如“治未病”“治未乱”“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等辩证性和整体性治理思想,彰显了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创新公共安全治理模式,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针对中国实际进行风险要素分析、结构整合和“脆弱性”补强,为公共安全风险预防提出中国解决方案,贡献中国治理智慧,将有力地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作者为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